

# 我国的县域差距与公共政策

## ——基于浙江省64县(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桢业,汪贵浦

(浙江工业大学 经贸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的县域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文章分析表明,浙江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差距变化大体上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县域差距呈扩大趋势,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县域差距则呈缩小趋势。而一个地区人口密度的大小(或者说农村城镇化水平)已成为决定县域差距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部门缩小县域差距的各项政策性努力,特别是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浙江县域差距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县域差距;威廉姆逊假说;公共政策;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10-0134-10

### 一、引言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国内县域经济的增长究竟是趋于收敛还是发散,这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的问题。早在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G. Williamson, 1965)在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后,认为国内地区间增长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间差距将逐步扩大,然后地区差距将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后,地区差异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威廉姆逊区域差异趋同假说。威廉姆逊趋同假说提出以后,在国际上曾引起较大争论。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自国家更详细的历史资料对该趋同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威廉姆逊趋同假说的各种论点,都能找到一些经验证据。比如,小阿莫斯(O. M. Amos Jr, 1988)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地区收入差异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不断缩小后,80年代后期又开始趋于扩大。由此,他提出了关于“在经济发展后期

收稿日期:2006-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Y032),浙江省留学归国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李桢业(1964—),男,吉林珲春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汪贵浦(1964—),男,安徽合肥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

阶段地区收入趋异”假说。库隆贝和李(S. Coulombe 和 C. Lee, 1995)在研究中发现,自 60 年代初期以来,加拿大各省人均收入和产出增长都在趋于收敛,这主要得益于区际贸易以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迪林等人(M. Dilling, R. Petersen 和 V. Smith, 1994)运用“追赶”理论分析了丹麦地区收入增长及其收敛性。结果发现,丹麦的县际人均收入增长也呈现出较强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主要是由地区产业结构和财政补贴引起的。

沿用威廉姆逊采用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对中国地区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牧野松代(2001)、杨开忠(1994)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大体上呈倒“U”型,即在 1978 年以前趋于缩小,之后则趋于扩大;而“三大地带”人均 GDP 差异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他们认为:从中国的经验看,威廉姆逊倒“U”型结论是不可靠的,地区差距变动并无统一的历史模式。陈和弗莱谢尔(J. Chen 和 M. Fleisher, 1996)利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发现 1978~1993 年中国各省人均 GDP 增长存在着有条件的收敛性。它取决于物质资本分享、就业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董先安(2004)、陈和冯(B. Chen 和 Y. Feng, 2000)也认为,90 年以来中国省际人均收入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性。他们把这种收敛归之于区域市场的开放和农村的工业化。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市场化将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地区差距。

可见,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指标、地域单元和分析方法,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然而,以上研究大都集中于三大地带或省际间差异,却很少有人把研究视野投向中国的县域差异上来。而据其他国家对地区差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某一地理单元内部的地区差异有时较同一地理单元之间的地区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况且,地区差异的衡量与地理单元大小息息相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仅仅进行宏观地带或省际间差异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代中国区域差异变迁格局的全貌。

县域经济作为中国位于省、地(市)之下的一级行政区域经济,它是中国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层次,它具有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对实现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我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浙江省为例。80 年代中期以来,浙江的县域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其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已连续 18 年“领跑全国”。而浙江农民的年均收入水平更是连续 21 年位居全国首位。目前,浙江的县域经济所实现 GDP 已占全省 GDP 的近 70%,成为浙江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在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全国百强县中,浙江以其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后盾,占据了近 1/3 席位(2005 年为 30 县)。然而,尽管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它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如浙江所拥有的 30 个全国百强县大多位于浙东北地区,而浙西南地区却尚存有 25 个欠发达县。25 个欠发达县的人均 GDP 只有浙江省平均

水平的一半。那么,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浙江县域经济的大发展,浙江的这种县域差距是否呈现了收敛趋势(或是发散趋势)?影响浙江县域差距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特别是近10年来浙江省政府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作出了各种努力(“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工程”等),这些旨在缩小县域差距的各项政策性努力,包括向欠发达地区投入的大量的财政补贴是否都起到了缩小县域差距的作用?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单元(包括两个副省级单元)共64县(市)的统计资料,对90年代中期以来的浙江省县域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证研究。作为县域经济发达省份,浙江在县域发展以及在缩小县域差距方面的经验,无疑是我国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财富。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具体找出哪些是影响我国县域差异收敛(或扩大)的主要因素,以及深入探讨财政转移支付等缩减地区差距的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供国内其他地区在发展本地县域经济时需要认真借鉴的经验和观点,同时给出我们的政策性建议。

## 二、提出解释性假说

对浙江经济的崛起,近年来理论界已经有了各种深入的探讨。这里我简单回顾一下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浙江的县域经济主要源于70、80年代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发展。在经过80年代广泛的市场化基础上,90年代进入加速发展期。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多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了“小资本、大集聚”的县域经济特色。这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共同轨迹。县级中小企业通过“企业集聚”,使企业在外经济、集体效率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作用下,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而企业的集聚,通常也带来了人口的集聚,人口集聚又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纺织城、诸暨大唐袜业城、新昌的化工城、上虞的精细化工、慈溪的小家电、乐清的低压电器、嵊州的领带城等城镇的迅速发展无一不起源于中小企业的集聚。浙江的县域经济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已经逐步摆脱了县域经济所固有的“农村性特征”。表现在县域从业人员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降低,而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加大。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又有力推进了浙江整个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按照威廉姆逊趋同假说的定义,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初始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地区间发展差距将逐步扩大,然后地区差距将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或扩散)增长阶段后,地区差异最终将会趋于缩小。那么,浙江在经过70~80年代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长期发展所构筑的县域经济基础,90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已进入威廉姆逊趋同假说中的经济扩散阶段。基于这一趋同假说和前述文献理论以及

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本文提出如下四个可供检验的假说。

假说 1:浙江的县域差异变化符合倒“U”型规律,即由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差距的持续扩大阶段开始向差距扩大幅度收敛阶段转化。

假说 2:地区从业人口结构的状况事实上也对人均 GDP 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县域人均 GDP 就越低。这在以后被很多学者所证明。如陆铭和陈钊(2004)在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人口规模之间关系分析后,发现二者呈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浙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连年下降,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规模却不断增加。显然,这种从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县域差距缩小产生一定影响。

假说 3:潘强敏(2005)、牧野松代(2001)都提到了城镇化对缩小县域差距的作用。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人口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通过城镇化,可以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促进县域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城镇化效应使公路、供水、供电等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这将有利于吸引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的集聚,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城镇化使市场容量变大,农村居民消费在总量上也足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而浙江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50%,城镇化无疑是浙江县域差距缩小的贡献因素之一。

假说 4:省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将有助于县域差异的缩减。从政府作用上看,毫无疑问,浙江的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解决本地区县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他们把着重点放在扶持浙西南的 25 个欠发达县的经济 development 上面。浙西南尽管在面积上要比浙东北大不少,但经济上却比浙东北要落后许多。为此,浙江省政府除了加快进行浙西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外,还为这些地区的农业和工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与浙东北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同时省政府派出技术人员到浙西南贫困地区进行技术援助和扶贫工作。浙江的衢州、丽水地区还采取了将欠发达县居民迁移到较繁荣地区的做法。农民移民在较富裕地区大多数转向工商业活动,从而增加了收入。经验表明,各级政府是消除县域差异的一只“看得见的手”。

### 三、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和变量选择。从统计分析上看,地区差距的变动受所选择的经济指标、地域单元、时点选择以及衡量方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资料限制,本文采用县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业人口规模<sup>①</sup>、人口密度、财政转移支出等指标作为基本的参数变量。所使用的各项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2005 年版、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2005 年版、《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4 卷)》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有关年版。分析期间为 1995~2003 年。为了比较起见,我们重点选取了 1995 年和 2003 年数

据作为代表作对比分析。由于1995年前后正好是浙江省政府对省内欠发达地区开始实施“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康庄工程”等政策的时期,因而上述期间,也正好能够考察浙江省近年来所实施的各项扶贫政策的效果。此外,1995年观察的县级单位数为64个,由于近年来一些县(市)相继被并入市区,已减少为59县。为了使样本数据以及分析结果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将杭州的萧山区、余杭区,宁波的鄞县,金华市的金华县,衢州的衢县的数据抽出,仍按相同的64县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个别县(市)少数年份数据缺失,我们采用相关指标前后年份的数据滑动平均代替。

(二)实证分析。威廉姆逊(Williamson,1965)在分析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中,发现国内地区差异与国家的大小有关,地理面积越大则地区差异程度就越大。由于浙江省县域地理面积相差不大,地理面积并不适合作为解释浙江县域差距变化的变量参数。因而本文主要考察三个变量,即经济发展水平(用县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城镇人口密度(代表城镇化水平)以及另一个变量即农业人口规模对浙江县域差距的相对影响。其回归结果列于表1。

表1 解释浙江省县域差距变化模型的回归系数

独立变量	1995年		2003年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1. 县域人均地区总值平均值	0.0006052** (0.0001265)	0.0007433 (0.0009642)	0.002634** (0.001750)	0.0002991 (0.0007682)
2. (1)的平方		3.45 E-08 (0.994 E-07)		5.693 E-05 (7.232E-05)
3. 人口密度	0.0000856 (0.0000902)	0.0003553 (0.0001076)	0.0002943*** (0.0000934)	0.0006162*** (0.0001025)
4. 农业人口规模	-0.0004553 (0.0024742)	-0.0003188 (0.002547)	0.0031054 (0.0045567)	0.003124 (0.0051743)
5.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3075	0.2307	0.6044	0.6326

注:\*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2、表3同。

由表1可见,1995年的统计分析中,各模型拟合优度十分不理想,只有模型1有些统计意义。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浙江省县域差距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那么县域不平衡程度就越大。与1995年结果形成对照,2003年数据拟合优度均有明显提高,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单个参数也是显著的,参数值远大于标准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模型中,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已成为解释浙江省县域差距变动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按理说,人口密度与县域差距的扩大应该没有必然联系。但实际上,人口密度过小(或者说城镇化水平过低)会削弱市场一体化形成和阻碍经济扩散,

由此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80年代末,当代表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块状经济”,在全省农村刚刚展开时,当时的人口密度与县域发展差异不存在相关关系(1988~1994年回归结果:调整后 $R^2$ 为负值)。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这种关系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人口密度的大小已成为影响浙江县域差距的主要因素。这似乎说明,“块状经济”(城镇化雏形)不仅能够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在带来了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缩小了城乡间以及县域间的发展差距。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省一级政府向县域财政分权和控制资源能力的下降<sup>①</sup>,人口密度的大小已逐渐成为决定浙江县域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浙江省的县域城镇基本上都是依托产业集聚发展起来的。较高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不仅带来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还降低了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公共基础设施成本以及交通成本,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这正是近10年来我们所观察到的浙江县域经济增长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同1995年一样,2003年农业人口规模数据对县域不平衡程度未产生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说3在两个时期都没有得到统计数据上的支持。这一结果明显不同于许多已有文献的发现。事实上在浙江尽管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商业、建筑业等非农产业,但从事农林渔业的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因劳力大量转出而出现下降,相反却有了明显提高。这还要归功于浙江农林渔业较高的市场专业化程度,由于农副产品生产完全依据市场供求关系运作,什么赚钱种(养)什么,因而农民收入普遍有较大增长。此外,政府除了在增加支农补贴、减免农业税费以外,还加大了对农业的直接财政补贴及技术投入力度。因而,在浙江从事农副渔业的农民收入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收入事实上没有太大差距。

从2003年的模型1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差距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为线性关系而不是二次方和关系。即从2003年浙江的横截面数据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地区差异的大小呈倒“U”型曲线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县域差距呈增大趋势,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县域差距呈缩小趋势。这一结果明确印证了我们前面所做的假说1。

最后,我们考察了1995~2003年一些变量对浙江县域发展差距的影响程度(见表2)。正如前面所期望的那样,人口密度(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大小再次成为解释浙江县域差距变化程度的首要因素。例如,在模型2中,因变量变化的39.3%可以由人口密度来解释。有趣的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对县域差距的变化不产生影响。然而,县域差距的原始状态却对浙江县域发展差异的变迁影响比较大。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最初地区差异越大,1995~2003年间县域差距扩大幅度就越小。这说明在此期间浙江县域差距呈一定收敛趋势。这个结论也支持了假说1的观点。

表2 解释浙江省县域差距变化模型的回归系数(1995~2003年)

独立变量	模型1	模型2
1. 1995年县域人均地区总值平均值	-0.0000681 (0.0001894)	
2. 1995年的变异系数	-0.6935274 (0.3512753)	
3. 人口密度	0.0274136*** (0.0445024)	0.002633*** (0.0001976)
4. 调整后的R <sup>2</sup>	0.414	0.393

#### 四、县域差距与公共部门政策

(一)财政预算补贴与县域差距。为了探讨省管县预算体制下财政转移与县域差距变迁二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构建了浙江县域财政转移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表3是解释浙江省县域财政补贴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从1995年和2003年这两年的统计分析结果中我们均可以发现,按县(市)人口平均计算的财政补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富县补贴穷县。同样,财政补贴与农业人口规模也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人口基数较少的县(市)人均财政补贴相对较多。财政补贴也与省内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由于浙西南的泰顺、庆元、龙泉、龙游、缙云等边远县是浙江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地区,这些县从省一级财政预算中获得了较多的补贴。然而,从表3中我们没有发现财政补贴与浙江县域差距二者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补贴与浙江县域差距的变动无关。流向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或多或少用于当地经济发展,这就很可能减缓这些县(市)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的趋势。然而,给予欠发达县(市)的财政补贴并不能减少县域发展差距。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地区差异一般呈扩大的趋势。即使我们假定财政转移支付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这种转移支付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才会有助于缩减浙江省内的地区差距。总之,由预算分配的财政补贴在短期内都不会有助于缩减浙江省的县域差距。

(二)政府作用。根据威廉姆逊(Williamson,1965)假说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区差距程度将保持稳定,继而将逐步缩小。实际上,杭州、宁波、绍兴等发达地区的县域差距已经开始缩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无非有两个:即经济扩散和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将趋向于集中,而且这些资源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然而,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经济扩散过程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扩散意味着资本为寻找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从经济中心流向外围地区。造成地区差距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行政上,发达地区的政府均比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可能更容易处理地区差异问题(魏后凯,1997)。因为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引起世人瞩目,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讨论经济扩

散过程,因为目前已有这方面很详尽的报道(吴妙丽,2004;凌耀初,2005)。

表3 解释浙江省县域财政补贴模型的回归系数

(1995年)			
独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1. 县级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值	-0.0006843* (0.0002267)	-0.0008978** (0.0002405)	-0.0005175 (0.0002261)
2. 贫困人口所占比例(%)	3.593642*** (1.207823)		2.9800340 (0.884318)
3. 人口密度		0.0018644*** (0.0005257)	0.0010424 (0.0006709)
4. 农业人口规模	-0.0093565* (0.0031551)	-0.022399** (0.0058741)	-0.0224713 (0.007558)
5.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7037	0.6542	0.7239
(2003年)			
独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1. 县级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值	-0.0001992 (0.0000268)	-0.0001370*** (0.0000426)	-0.0000961*** (0.0000167)
2. 贫困人口所占比例(%)	1.0884406** (0.6823155)		3.1642660 (1.324465)
3. 人口密度		0.0006761* (0.0001332)	0.0003129* (0.0001154)
4. 农业人口规模	-0.0824661 (0.001029)	-0.0064045 (0.0016755)	-0.0010017 (0.0008295)
5.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7408	0.7924	0.8321

毫无疑问,浙江省政府十分重视解决省内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他们把着重点放在扶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上面。这些不发达地区主要包括浙西南的25个山区县和3个海岛县,它们绝大部分分布在浙江与福建、江西的交界地带。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省政府主要依靠财政预算来为不发达地区提供援助。然而,到了21世纪初,援助方式已不只限于财政预算,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扶贫工程,如“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等。近年来,浙江省开展的科技扶贫政策(如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政府的行政动员(如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开展对口支援)等也初见成效。显而易见,通过援助办法,浙江省的县域差异程度比起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均已有所收敛。然而,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目前还不能对政府行为与县域差距减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尽管其效果一时还难以衡量,但无可置疑,省一级政府的努力的确有助于省内地区差异的减缓。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各级地方政府,比如杭州市政府开展的“中心城镇集聚”、“交通西进”等缩减地区差距的政策。“交通西进”是指通过建设距杭州1小时半高速交通网,将杭州周围5县(市)融入杭州大都市经济圈。淳安、建德等距杭州最远且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县也因此受益。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总体上看,浙江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差距变化大体上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县域差距呈扩大趋势,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县域差距呈缩小趋势。而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密度的大小(或者说农村城镇化水平)已成为决定县域差距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发现,所谓差距缩小地区也正是那些市场一体化已经形成、块状经济(城镇化)开展得较好的地区。也就是说“块状经济”较之城市工业化更易于阻碍地区差异的扩大。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本区域内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有效的政府干预又能够有助于刺激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县(市)流动。就浙江省的欠发达县(市)而言,缩小差距的前景在短期内还不容乐观,即使省一级公共财政拨款支援贫困地区解决省内地区差异也是一种短期效应。就长期而言,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能是加速实现本县(市)经济快速增长,推进农村中小城镇建设,由此带动二、三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提议:(1)要大力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中小城镇,使本县域有限的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工业与服务业向县城集聚。通过经济要素的集聚来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2)县域经济应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循环,主动参与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产业协作,在区域范围内获取、组织和配置资源。尤其是贫困县应加强与发达城市的经济合作,在发达城市及邻近周边较发达市场中谋求发展。(3)从浙江省县域发展的经验上看,政府在缩小县域差距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它不仅增强了县域经济活力,也能够保证省里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欠发达地区。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支农补贴、农技支援、村庄建设、农民培训、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也明显起到了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 注释:

- ①这里指从事农业产业人口数,具体指16周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劳动者。
- ②建国以来浙江一直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地(市)管县”体制,而是长期坚持“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使县级单位能够集中更多财力来发展县域经济,这是浙江县域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 参考文献:

- [1]潘强敏.对浙江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分析和思考[J].浙江经济,2005,(12):17~19.
- [2]吴妙丽.浙江县域经济活力四射——对我省30个百强县竞争力的解读[N].浙江日报,2004-11-17,(3).
- [3]凌耀初.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 [4]魏后凯.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

社,1997.

- [5]杨开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 经济研究,1994,(12):59~67.
- [6]董先安. 浅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1952~2002[J]. 经济研究,2004,(9):48~58.
- [7]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2004,(6):50~58.
- [8][日]牧野松代. 90年代中国地域差距的动向[J]. 商大論集,2001,52(5):99~136.
- [9]Williamson J 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5,(4):3~45.
- [10]O M, Aoms Jr. Un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8,(4):549~566.
- [11]S Coulombe, F C Lee. Convergence across Canadian provinces,1961 to 1991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88,(4):886~898.
- [12]Jian Chen, B M Fleisher.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22):141~164.
- [13]B Chen, Y Feng.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opennes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0,(11):1~15.
- [14]M Dilling, R Petersen, V Smith.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Danish regional incomes [J].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4(1):54~76.

## County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of China ——A Posi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64 Counties

LI Zhen-ye, WANG Gui-pu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64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gnitude of Zhejiang county regional inequality shows inverted “U” letter curve. In other words, inequality of the undeveloped regions tends to increase, while inequality of developed regions tends to decrease. Although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are difficult to measure for the moment,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supporting the poor policy of province government slowed down the growth of county regional inequal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county regional economy; Williamson hypothesis; public policy; positive analysis

(责任编辑:许柏)